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11)

弋舟的写作可视为对人之存在困境或他所说的“幽暗的厄境”的探询。他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并无清晰的时代背景,有意赓续由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开创的先锋小说传统,注重形式和叙事实践,追求文化和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另一类则把目光放在当下,通过相对简单的情感故事去表现复杂的时代变迁和精神镜象,达到以简驭繁、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幽暗的厄境

《时代医生》《桥》等小说可看作是弋舟“先锋写作”的代表。《时代医生》写两个刚毕业不久的眼科医生,一男一女,第一次共同参与一台手术,给一个患有轻微斜视的小男孩治疗眼疾。手术后,这个同时患有严重肺癌的小男孩常常用手去捂自己的左眼,这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把本应该开在右眼的刀开在了左眼上。很快,小男孩的病情急转直下,体内迅速转移的癌细胞使他捆绑还没有打开便死了在医院的急救室里。参与手术的男医生最终确认了一点:伤口的位置是正确的,手术并没有发生意外。“男孩生前的动作,也许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也许只是牵拉后的眼外肌令他感到了左眼的不适……”说起来,这只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故,对这两位医生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在事故的谜底并未完全揭开时,他们便陷入惊恐之中,觉得“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抽象了,全部凝聚成一股力量针对着他们那小小的心脏”。也正是这场事故使他们的关系变得复杂,他们成了情人、夫妻,后来又离了婚。子虚乌有的事故可以被澄清,那种“与生俱来的莫须有的恐惧”却再也无法摘除,他们只能在恐惧的重负中生存。他们一生的幸与不幸,似乎都与此不无关联。

《谁是拉飞驰》《桥》《鸽子》《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等小说,也承载着弋舟在文化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具有某种超越的气质。

弋舟的写作,大概经历了一个由虚而实的过程。越是接近当前,写实的色彩越重。《嫌疑人》《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李选的踟蹰》《等深》等小说,便带有鲜明的“新世纪”印记。在这一批作品中,弋舟对当今时代诸多问题的观察,常常是以上世纪80年代为参照的。在他或他小说中的人物看来,80年代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一个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时代。80年代末是社会历史的分界线,两个时代虽然不无关联,但彼此的精神状况大不相同。在90年代以后,社会已偏于务实,甚至是过于务实,以至于人们不再有任何真正有重量的精神追求。理想与浪漫、诗意和激情,都成了一种“剩余的”记忆。弋舟也愿意于从不同阶层的人与生活入手,来展现时代变迁的不同侧面。

诗人、作家往往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敏感的心性、敏锐的直觉,使得他们对时代的幽微转折洞若观火。《嫌疑人》正是以诗人作为主角。小说里的格桑原来是一位诗人,在西藏居住多年。“后来他离开了那块遍地诗意的地方,回到生他养他的这块盆地。生活在这块盆地,格桑被抽丝剥茧般地还原,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有了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有了亚健康和一个女儿,诗当然是不写了……”整个故事既是对一个诗人人生的打量,也是对社会转型的隐喻式书写,暗含着对商业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批判。《嫌疑人》带有浓重的抒情气息,而抒情在里而单是一种写作手法,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后者的衰亡,才是真正让格桑感到难过的所在。

在《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里面,底层百姓成了小说的主角。时代的巨大变化,令格桑这样的诗人黯然神伤,

弋舟:本名邹弋舟,祖籍江苏无锡。“70后”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二、三、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第六、七届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弋舟的小说》等。

有情所累此生

□李德南

愁肠百结。而在小说里的曲小、曲兆寿等底层百姓的眼中,当今时代几乎成了一只无情、凶悍的庞然大物,是需要予以肉搏的对象。他们的工作和身份,他们的尊严和价值,都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剥夺。更为反讽的是,他们甚至只能靠不断地降低自己、匍匐在地,靠无耻和耍赖才可能赢得生存的权力。比较而言,《嫌疑人》依然有“抒情诗”的味道,《天上的眼睛》《我们的底牌》则俨然成了“讽刺剧”。

对于不少“有钱有闲”的人而言,他们所过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平淡和无聊成为他们人生的基本处境。《李选的踟蹰》里的单亲妈妈李选,正是在“闲极无聊”的时刻,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学同学曾毓,开始和他有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的交往处处透露着小资的情调。当然,这种平淡、平庸的生活也不乏压力和危险。李选和她的上司张立均之间被置入了诸多职场上的权力因素,让她对张立均有一种依附与被依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对李选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局面,她所能做的只是严格地遵守“世界已经约定俗成的那部分规则”。尤其是当李选和同事小苏因对李选有觊觎之心而被张立均解雇时,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他的附庸。张立均能够这样“不分说地”毁掉小苏的生活,自然也能毁掉她的生活。

人生的“耻”与“罪”

在中篇小说《等深》里,时代的变迁被小说的叙事者刘晓东看作造成“一代人的溃败”的根源。这种溃败涉及社会建制与个人生活、物质与精神、道德与心灵等不同层面。这不单是对外部世界的批判和否定,也是自我生存感受的表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晓东,包括弋舟其他小说中的叙事者,常常把自身也视为需要予以否定的对象。这些人身上有着浓重的耻感、罪感和非常强烈的自省精神。

在不少作家的作品中,作家的潜在主体在小说中往往只是审判者或受害者,不需要承担任何的罪与罚。而弋舟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时时解剖自己”,也经常“无情面地解剖自己”。面对种种“幽暗的厄境”,他们常常充满耻感和罪感。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尼尾常喜在论述鲁迅的著作中,曾把“耻”看作是一种包括“耻辱”、“惭愧”、“含羞”等不同形态的、意义相当宽泛的意识。“‘耻’是在自己之中兼具‘能够看见的自己’与‘看人的自己’的意识。所谓‘看人的自己’,是指人给自身设定的典范或征象;而‘能够看见的自己’,则是在这一典范或征象映照之下显出否定性真相的‘现在的自己’,换言之,这是同典范或征象相背离的意识。人希望弥补这种背离,超越现在的自己,因而在这种深度的背离之前不能不表现出含有紧张的沉默。”也就是说,耻感,主要是指主体或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建立起的一种道德自觉或伦理意识。对于种种可说或不可说的痛苦,可解或不可解的生命无常,种种令人惊悚的残酷真相或价值沦陷,弋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会怀有浓厚的耻感——尤其是当上述的种种都指向自身的时候。

以耻感为基础,弋舟小说中的人物,常常还有浓厚的罪恶意识。这不单是指某人犯了法律意义上的罪,还意味着,“我”具有道德愧疚或良知意义上的罪。他们会觉得,当前世界的种种恶与不幸,都与“我”脱不开关系,“我”是其中的参与者,甚至是根源。“我”对此负有责任,甚至是根本性的责任。因此,罪感也是一种共同犯罪的意识。

在《锦瑟》中,京剧团的琴师“老张”曾因为自己年老却依然有性欲、甚至忍不住去嫖娼而感到羞耻。在他的外孙女林彬杀害导师家的保姆秦美之后,这种耻感便上升为罪感。老张觉得,正是因为自己的荒唐举止,林彬才会去杀人,这是根本原因。“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老天给了我最严厉的

处罚,他把一头老公羊犯下的错加在一头无辜的羊身上。”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彬杀人和老张并无直接的联系,但这种“耻”与“罪”的意识,对老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通过这种耻感和罪感,使得他彻底地逼视个人的灵魂与自我。也正是因为这种切身的耻感和罪感,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也就是林彬的博士生导师“张老”,在目睹了秦美那“混世的阴谋与卑劣的诡计”之后,会在心里生出悲悯和宽恕。也正是因为这种耻感和罪感,使得他在获悉林彬杀人时,引发了直接的救赎行为,希望能替林彬顶罪。他们的心灵告白,都带有忏悔的意味。

有情的叙述

弋舟的小说,之所以有这么多关于“耻”与“罪”的表达,与他信仰基督教不无关系。翟文斌认为,“弋舟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但是,他绝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图解教义,而是借助宗教文化把他对人生、人性的思索引向纵深。他对犯罪的反反复复书写,深层里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对人性的不信任感和对生命原罪的深刻体认,而宗教文化还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他自觉的宿命意识和深沉的悲悯情怀。”这是对弋舟小说非常有洞见的分析。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阐发的是:为了让“耻”和“罪”的意识更符合中国人的实际人生,为了能借此更好地勘探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弋舟往往会以“情”作为书写的重心。

弋舟笔下的人物,很少一开口就谈教义,也并非都有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对于亲人、朋友和爱人,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们被各种困境所包围,经常有一种找不到出路痛苦,让他们觉得更不堪的是,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也在“幽暗的厄境”中。《跛足之年》中的马领,能接受自己活得如此痛苦,却一心让自己的妹妹马袖活得幸福。《锦瑟》中的“老张”,也是因为自己的外孙女杀了人,加倍地放大了自己所该承担的罪与罚。

除了亲情,爱情也是弋舟小说中的人物所念兹在兹的。在《李选的踟蹰》中,弋舟曾围绕着“情”,“结合着‘爱’的图景”,认为我们生活过的时代“是一个‘非诚勿扰’的时代,是一个电视相亲秀盛行的时代,是一个男男女女可以大大方方在屏幕上以香车宝马为资本来定义爱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交换,空前地成为了爱情约定俗成的第一要义,理直气壮,速成又速朽着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在这样一个讲究实效,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人难以再“保有磊落的爱意”,也“不再具备契阔的深情”,李选和曾毓也因此爱得踟蹰,直到跌入绝境,才多了一份决绝。对于弋舟小说中的人物而言,正是因为有这无法割舍、难以忘怀的“情”,他们此物此生,才活得特别累,“耻”和“罪”的意识也才会一直在心头盘旋。他们的体验和遭遇,也许正好印证了一个说法:“无缘何生斯世,有情所累此生。”

这种以“情”为核心的书写,显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有着深入了解才能做出的安排。按照李泽厚的观点,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一种乐感文化,缺乏对彼岸世界的信仰,着力于肯定此生此世的价值,以身心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作为理想和目的。“情本体”又是乐感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是以“情”,以家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也只有经由“情”这一载体,经由这种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弋舟笔下那些人物的“耻”与“罪”,才真正令我们觉得彻悟、动容。借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固然活在绝望中,但也不乏微弱的希望;他们有卑微的一面,但也不乏尊严;他们未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也常常展示出一种令人钦佩的教养和举止。他们都是有道德感的、庄重的人,弋舟的写作,也是一种庄重的写作。

创作谈

写作十余年,仍然是青年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所谓“青年作家”,想必首先是以年岁计,尽管此间的尺度模棱两可——没人能够告诉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刻,你便不再“青年”;其次,所谓“青年作家”,必然也影射着某种创作状态,不出所料的话,“不成熟,有待提高”,乃至“有活力,堪可期待”,这样正反两个方面的辩证,都是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年岁的事儿,无可辩驳,谁都是只能坐等年华老去;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状态,由于事关“辩证”,就有了可说的余地。

2000年,我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是年我28岁,很“青年”。千禧之年,我在那个被强调出来的时光门槛前,提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今天看来,对于时代的敏感,正是我这样一个青年提笔之时最大的动因。

有没有顾恋自己所在时代的写作?对我而言没有。作为一个书写者,我的情绪、经验与世态冰凉之间必定难以断然切割;我的痛苦何来、欢乐何来,必定首先需要还原到具体的世相之中。于是,我这个青年,在“时代”的感染下,被那个以整数纪年的年份蛊惑着写起了小说。十多年来,我写下了大约300万字左右的作品。之所以罗列这样一些数据,首先是为了切题,我想弄清楚自己这样一个青年作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梳理的过程中,意义也仿佛豁然来临。当我去回潮,除了会必然地感伤自己此“青年”已非彼“青年”的事实,尤为令我吃惊的是,面对“时代”这个背景,针对我这样一个青年作家的写作,竟具有更为切题的意义。

“时间”是小说艺术最不可或缺的要义之一,它在形式与内容上,素来是这门艺术最为器重的器械。在这里,我想表达的不是这一利器在小说中所向披靡的普遍性意义,我想说的是,当我以“千禧年”来策动我的写作时,“时间”已被置换为“时代”这样一个变格。

和任何艺术一样,小说从来就在“单纯”与“复杂”之间牵扯着她的张力。“单纯”关乎天赋,是上帝给予一个小说家的不二法门;而“复杂”只能来自尘世,来自个人所处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本雅明那个著名的判定:“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离群索居,一个多么难以完成的指标,我非不愿,实不能。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几无转圜余地地剥夺你离群索居的权利;而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几乎没有了争取这种权利的勇气。我们呼吸着这个时代的空气,贪婪着这个时代的资讯,被这个时代的呼吸和贪婪滋养与戕害,在这个时代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训练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技艺,被规定与侵袭,还需要额外的说明吗?

那么,在这样一个奔跑着的一切皆在“提速”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品质发生了怎样的位移?对于文学而言,最为致命的是,她本是一个应当何其缓慢的姿势,被裹挟在峻急的时代里,文学难免步履踉跄,事故频发。文学现场里的事,必定会伤害及我们每一个书写者,无论如何,不管你是一个看客还是当事人,你都在场。离场虚构,在某些时刻象征性地实现离群索居,这是上帝恩赐给小说家的最好礼物。如何让现在进行时的“场”,成为我们一切虚无感的起点?答案是,你必须到时间纠缠。读写经年,我当然首先是在临场辗转;我体会了所有这个时代应该体会的况味,感染了这个时代文学现场一切能够感染的积弊。我自认是一个敏感者,否则不会去写小说,何况我还“青年”,一个“青年”敏感者,过分地感知世界,这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自认不是一个健康者,大口呼吸的同时,有着一切文学细菌都能将我感染的风险。由此,极有可能,这个时代的文学事故对我更具杀伤力。如今回潮,十多年来,我的写作堪可当作一份厚病的病历,一个青年作家所能够犯的一切毛病,我几乎都犯过。我可并不想因此沮丧。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被这样复杂地训练过之后,变得世故,是一个青年作家最大的陷阱,而过分沮丧,恰是导向世故的致命根源。

如今我惟一惧怕的是在写作中被同一条壕沟反复摆倒。就我而言,最容易摆倒自己的那条壕沟在自己的骨子里——就是所谓的“天性”,当然,我珍爱我的“天性”,但我必须承认,全然依靠“天性”所写下的那些作品,如今已很难令自己感到安慰。它们曾经对我堪称重大的支撑,如今已日渐崩塌。靠着天性发言总是相对简单与轻易,就好比石器时代总是容易泾渭分明。作为一个年逾不惑的小说家,我还能够被允许以“青年”为口实,仅凭着天性来书写吗?如果我足够尊重小说这门艺术,足够尊重这个已经远非石器时代的今天,我就只能向着更为艰难和复杂的方向跋涉,不惮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来修正我的道路,因为,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也许,当我竭力以整全的视野来关照时代大气质之下的个体悲欢时,才能捕捉到我天性中力所不逮的那些破绽,这也许会赋予我的写作一种时代的气质,惟有此,才能解决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轻浮。

中国作家海南行活动举行

本报讯 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作协主办,天涯杂志社承办的“走进阳光地带——知名作家海南行”活动近日启动。该活动特约国内实力派作家,特别是散文家,深入海南各地,包括南海诸岛开展采风活动,创作以海南元素为素材的文学作品。

目前已应允前来参与本次写作活动的首批作家有刘恒、刘庆邦、陈世旭、叶永烈、毕淑敏、达理、于坚、林白、刘亮程、王祥夫、刘齐、刁斗、林那北、沈苇、周晓枫、梅卓、付秀莹、乔

叶、格致。他们从5月起将分批前去海南,对海南的自然风光及民俗民情、历史文化进行深度体验,为大美海南“撰文立说”。

另外,天涯杂志社还与天涯社区联袂举办“走进阳光地带”大型美文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向广大作者征集以海南元素为题材的内容健康、格调优雅、文字精美的散文作品。两个活动将持续半年时间,产生的优秀作品将编辑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

(南文)

《九曲流沙》讲述河南百年历史变迁

本报讯 近日,杜建辉长篇小说《九曲流沙》新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九曲流沙》由引子和33章内容构成,计74万字。主要以主人公紫龙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为主要线索,以河南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通过描写多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和近现代历史中发生在河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了河南人民为追求民主自由百折不挠的抗争过程,弘扬了中华民族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坚忍不拔、前赴后继的探索精神,以点带面地呈现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百集纪录片《诗词中国》开始拍摄

本报讯 近日,百集纪录片《诗词中国》拍摄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该纪录片由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社CNC电视台、全国妇联儿童部联合拍摄,邀请海内外文化名家作为主讲嘉宾,以3000年来中国优秀诗词作品及著名作者背后的故事为脉络,向广大观众呈现中国诗词的精华。从《诗经》到《楚辞》,从汉魏六朝诗

与会者认为,杜建辉深刻地认识到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量将思想史和历史学知识引入小说,通过对历史基本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试图还原历史现场。这是一部大容量的作品,用略带传奇的叙事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呈现,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一部河南历史的百科全书。书中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近200个,囊括了河南社会的各个阶层。小说还对众多人物的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惯等进行了描述,并且在人物对话里大量使用河南各地方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李晓晨)

歌到唐诗宋词,从元曲、明清诗词到近现代中国的优秀诗篇,该片共选取了800余位诗人的1000余首诗词,形成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化巨片。总导演阎宇介绍,这部纪录片在创作风格上将打破常规,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平易路线,从大众关心和感兴趣的故事入手,让经典诗词更加贴近观众。

(吴晨)

腾讯书院举办“文学系列”讲座

本报讯 4月22日和24日,腾讯书院邀请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在清华大学举办两场文学讲座,主题分别是“从莫言说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危机”、“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现场,许子东不仅进行了颇具个人见解的演讲,更与清华学子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在第一场讲座中,许子东首先分析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接着,他以《红高粱》为代表,细致解读了莫言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最后,许子东还谈到,作家的年龄结构老化是中国当代文

学面临的一个困境,他说:“中国当代的活跃作家不像以前,每十年换一批,现在这批作家已经活过了30年,而下面的人还没法取代上去。”

在讨论网络文化的第二场讲座中,许子东认为,民族与性是当下网络文化的最大热点,中国人往往在现实中争做精英,在网上却力挺草根。在面对贪污腐败等现实问题时,网民往往会绕过法律,直接下判决书。最后他还表示,网络实名制可以防止侵犯隐私、人肉搜索等行为,从长远来说未见得不好。(行超)

(杨筱红)

学面临的困境,他说:“中国当代的活跃作家不像以前,每十年换一批,现在这批作家已经活过了30年,而下面的人还没法取代上去。”

在讨论网络文化的第二场讲座中,许子东认为,民族与性是当下网络文化的最大热点,中国人往往在现实中争做精英,在网上却力挺草根。在面对贪污腐败等现实问题时,网民往往会绕过法律,直接下判决书。最后他还表示,网络实名制可以防止侵犯隐私、人肉搜索等行为,从长远来说未见得不好。(行超)

李祝尧作品研讨会在衡水召开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作协、中共衡水市委宣传部、衡水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李祝尧作品研讨会在衡水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对李祝尧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评论。

李祝尧在党委机关工作了30年,于1992年弃政从文。20年来,他写出了770万字的文学作品,发表出版512万字,其中出版长篇小说《村夫情》《枝叶情》《世道》《班子问题》等10部,其中《世道》被评为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并被改编为30集电视剧《乡里乡亲》。

与会人员对李祝尧的作品和创作态度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认为,李祝尧之所以笔耕不辍,是因为一个“爱”字,一是对家乡和父老乡亲的爱,二是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没有功利目的的爱。因为爱,他时刻关注社会变革,不断深入生活,所以写出来的作品真实厚重。他的作品敢于面对现实,紧紧抓住社会的热点问题,褒奖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他巧拟独特题材,作品褒贬张弛有度,人物栩栩如生,故事脉络清晰,语言质朴平实。(元文)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第三十届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颁奖典礼日前在武汉举行。苏画天、夏超、王家铭等77位大学生诗人在创作组比赛中获奖,来自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10组选手在朗诵组比赛中脱颖而出,在颁奖当晚举行了最后决赛。

樱花诗赛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于1983年发起,最初只局限于武汉大学内部,后来逐渐发展为一项面向全国高校学生的赛事,于每年樱花盛开的时节举办。本届的创作组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100余所高校的1383份作品,最终有77份作品获奖,其中设特等奖一名,奖金2万元。诗赛评委、诗人李少君表示,目前在各高校中有很多的学生诗人,他们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需要得到肯定和鼓励。通过举办比赛,以较高的奖金奖掖优胜者,将对大学生诗人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从本届参赛作品来看,现在大学生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所写的诗作题材比较多元,语言也较为纯熟。

朗诵组比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9所高校的400余组选手参赛,10组选手进入决赛并决出一、二、三等奖。在决赛中,评委、央视主播李文静较高的奖金奖掖优胜者,将对大学生诗人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从本届参赛作品来看,现在大学生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所写的诗作题材比较多元,语言也较为纯熟。

朗诵组比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9所高校的400余组选手参赛,10组选手进入决赛并决出一、二、三等奖。在决赛中,评委、央视主播李文静较高的奖金奖掖优胜者,将对大学生诗人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从本届参赛作品来看,现在大学生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所写的诗作题材比较多元,语言也较为纯熟。

川江号子“中国行”启动

本报讯 以即将消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号子为主题的大型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日前在京“唱响”,这也标志着川江号子正式走出重庆,拉开了“中国行”的序幕。《印象武隆》是由“印象系列”总导演王潮歌、樊跃担任总导演,张艺谋担任艺术顾问的山水实景演出作品,同时也是印象系的首个实景歌会,自2012年4月23日公演以来曾创下了连演262场的佳绩。

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那些拉纤的人、那些喊号子的人,那些最原汁原味的文化符号,都在渐渐消逝,渐行渐远。如今,川江号子已经成为落寞的千古绝唱,巴渝大地上会唱“川江号子”的人已经不是20个。《印象武隆》重新唱响曾经响彻巴渝大地的重庆“号子”,不仅是为了呈现艺术和表现思想感情,还希望这些即将流失的文明在日久传唱中,永远铭记人们心中。(晓文)

青年作家与时代

□弋舟

第三十届樱花诗赛颁奖